

复旦日本研究丛书

日本经济体制的历史变迁

理论和政策的互动

冯 玮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复旦日本研究丛书

日本经济体制的历史变迁

理论和政策的互动

冯 玮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经济体制的历史变迁:理论和政策的互动/冯玮
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复旦日本研究丛书)
ISBN 978-7-208-08263-2

I. 日... II. 冯... III. 经济体制—研究—日本
IV. F131.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85490号

责任编辑 周 峥
封面装帧 张志全

· 复旦日本研究丛书 ·
日本经济体制的历史变迁

——理论和政策的互动
冯 玮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33.5 插页 2 字数 460,000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08263-2/F·1818

定价 48.00 元

目 录

绪言: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研究状况综述	1
第一章 关原之战后日本经济体制的嬗变	15
一、关原之战和幕藩体制的建立	15
二、小农自立和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	24
三、江户三大改革:殖产兴业政策的源头	33
四、“财阀”的出生和“日本型经营”的萌芽	41
五、现代金融体制的温床:江户时代的金融业	51
第二章 江户时代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的转型	60
一、江户时代最初的“经济学家”	60
二、经济合理主义者和流通合理主义者	68
三、农本主义经济论者	77
四、日本型重商主义经世学者	85
第三章 “日清战争”前后经济结构和体制的激变	96
一、殖产兴业:日本现代产业的形成	96
二、“日清战后经营”:经济体制史的里程碑	109
三、从“政商”到“财阀”和“官商一体”的象征	118
四、“二重结构”的母体:“株式会社”的勃兴	133
五、“自由劳动者”的产生和“三大神器”的隐现	144
六、现代日本金融体制的滥觞	161
第四章 明治时代影响政府决策的经济思想和理论	175
一、“殖产兴业”和“日清战后经营”的指导理念	175
二、引进西方经济学的先驱	188
三、“国民教师”的“贸易立国主义”	200

四、“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的“三大贡献”	210
五、贸易“自由”和“保护”之争	220
第五章 一次大战和现代经济体制“四大特征”的显现	232
一、日本资本主义体制的结构性变化	232
二、“大战景气”的刺激和“昭和恐慌”的冲击	244
三、从“引导”走向“统制”的政企关系	256
四、“日本型经营三大神器”的成型	267
五、“间接金融”的迅速发展	278
六、“日本经济二重结构”的形成	289
第六章 大正至昭和初期影响深远的经济理论和争论	303
一、“日本式劳资关系原型”的理论和实践	303
二、“本世纪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	314
三、“日本法西斯理论鼻祖”的思想和理论	327
四、“井上财政”和“高桥财政”的指导理念	337
五、“金解禁论争”	351
六、“日本资本主义论争”	362
第七章 二次大战和“四大特征”的确立	375
一、“总体战体制”的构建	375
二、“政企关系”的激变	388
三、“日本型经营三大神器”的定型	401
四、“间接金融体制”的确立	413
五、“协力体制”和“互相持股”的形成	425
第八章 昭和后期至平成时期褒贬“四大特征”的理论和 学说	443
一、解构战后经济民主化改革“三大支柱”	443
二、辨析“日本株式会社”	458
三、“日本型经营三大神器”的“利”和“弊”	474
四、战后日本金融体制的“光”和“影”	490
五、“二重结构”和“互相持股”的“善”和“恶”	508
后记	528

绪言：现代日本经济体制 研究状况综述

同欧美国家相比，现代日本经济体制具有四大特征：第一，在“政府和企业关系”方面，双方相互依存，构成一种封闭的格局。第二，在“企业内部关系”方面，拥有“日本型经营”的“三大神器”，即长期雇用、年功工资序列（工资随工龄递增）、企业工会（工会按企业而不是行业组成）；第三，在“企业和金融业的关系”方面，拥有“间接金融体制”，即相对于“直接金融体制”通过资本市场发行股票和公司债券等方式融资，日本企业主要通过银行信贷筹措资金，并因此重视从业人员甚于股东；第四，在“企业和企业的关系”方面，存在大企业和中小企业通过“承包”（下請け）而互相依存的“二重结构”，以及系列企业内部、企业和金融机构相互控股的机制。^①

对上述“四大特征”，似有必要对诸项略加说明：（1）自美国学者阿贝格伦提出“日本株式会社论”，即以此形容日本政、官、财一体化体制后，关于“政府和企业关系”，“日本株式会社”成为形容这一关系的代名词。（2）“长期雇用”亦被称为“终身雇用”。1996年日本政府的《经济白皮书》称之为“长期雇用”。（3）日本间接金融体制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主银行制”，即特定的银行和企业之间具有包括信贷在内的各方面联系；（4）所谓“二重结构”，由有泽广已于1957年发表的《日本雇用问题的基本认识》一文中首次提出。同年，日本经济企画厅发表的《昭和三十二年度经济白皮书》指出，

^① 冈崎哲二、奥野正宽编：《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源流》，日本经济新闻社1995年版，第1页。

日本经济存在着企业规模、雇用方式、工资待遇等迥然有异的“二重结构”。拙著的论述,将围绕“四大特征”展开。

长期以来,中日学术界对具有上述特征的战后日本经济体制形成于何时,存在着各种不同理论。据管见所及,大致有下列几种理论:

一、文化传统论

按照文化传统论,“日本的经济体制具有日本独特的文化背景,根植于日本民族的特性。日本型企业和官僚制的原型,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的‘藩’和‘家’。可以认为,连带意识和平等主义的根源,早在农村共同体中就已经存在。”^①例如,按照浅田毅卫的观点:江户时期的商家“家训”作为前期资本(享有特权的御用商人)的资本蓄积理念,以及作为明治期政商资本的企业活动理念,构成了“日本式经营理念”的历史原型。^②

二、战后改革论

战后改革论认为,战后初期由美国主导的民主化改革,使日本的政治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变化,使日本告别了历史,重新获得新生。例如,原朗在《战后50年和日本经济:从战时经济到战后经济》一文中提出,应该充分关注战前和战时(1937年以后)“连续和断绝”两个方面,以及从战时至战后初期(20世纪50年代)一以贯之的经济统制期(战时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体制时期和“旧金山体制”时期)。他认为,在经济统制时期,更应重视战后改革引起的变

① 野口悠纪雄:《1940年体制——别了,战时经济》,东洋经济新报社2002年版,第18页。

② 浅田毅卫编著:《殖产兴业政策的轨迹》,白桃书房1997年版,第55页。

化,而不是战时的变化的决定性意义。按照他的观点,“正是通过战后改革,日本才经历了长达 20 年的高速增长,使日本国民的生活水准、生活方式同战前相比出现了显著变化。”^①《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第八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也在前言中写道:“经过三天深入的讨论,中日两国学者就以下问题基本达成了一致的看法: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日本经营方式。战后形成的日本经营方式主要包括长期雇用制、年功工资及晋升制、企业工会及以主力银行为核心的产业组织。”^②

三、两种经济体制论

寺西重郎的《日本的经济体制》堪称“两种经济体制论”的代表作。他在该书中写道:“我们当前关心的经济体制是高速增长期的经济体制。许多学者在论述这一体制时,经常和战时经济体制进行比较,经常探讨前者在多大程度上继承了后者的遗产。但是,这种方法作为历史分析方法是不充分的。我们在历史地考察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时,在考察经济高速增长期的经济体制时,必须把战前已经存在的经济体制,即至少把我们所谓的明治大正经济体制包括在内并进行比较。因为,规定高速增长期经济体制形态的各种外部条件,如后发性等,与其说产生于战时,毋宁说产生于明治初期。现在我们所面临的与日本经济体制相关的各种问题,也都是由于明治以后各种条件不断发生变化而产生的。对此,我们切不可忽略。”作为这一观点的论据,寺西重郎提出了两点理由:

“第一,这两种经济体制,都是在日本明治以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广泛的各阶层的人们围绕经济体制的选择的互动中形成的。换言之,这两种经济体制均是由许多人自觉选择的经济体制。

① 原朗:《战后 50 年和日本经济——从战时经济到战后经济》,《年报日本》创刊号,1995 年。

② 《日本的经济发展与劳动问题——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第八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 页。

明治大正经济体制至1900年左右基本一以贯之,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进入了调整过程,在形成战时经济的过程中消失。这一经济体制在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战后经济运营(所谓“战后经营”)开始时,以通过全国市场的整合形成国民经济,以明治宪法体制下政府和民间的不同作用被确定为前提,在国民统一意志的基础上建立。同样,高速增长期的经济体制,是在使用由战时留存的人力和物资资源重新开始高速赶超欧美时,由以1955年体制为象征的作为战败处理和战后改革的实施结果作为条件,按照一种统一意志形成的。”

“第二,在这两种体制中,此前的经济体制均得到一定程度的维持,而且人们是在意识到现体制和前体制存在连续性的前提下进行活动的。当然,在现实中,经济体制必然要发生不断的变化。在一定时期内,体制的不变和持续只能是一种假设或期待。但是,前瞻性地预测经济体制是否有持续的可能非常关键。至少,要使宏观经济能顺利运作,如果无法预见人们是否将对体制表示拥护,无法预见在一定时期内体制是否将具有稳定性,是不可能的。换言之,既然经济增长是由迂回的投资过程实现的,那么作为经济增长前提条件的对经济体制持续性的认识,便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可以认为,由于这两种经济体制均是在赶超(欧美)、在亚洲孤立地展开工业化,以及与政府介入经济思想的强弱相关等比较稳定的外生条件下形成的,并且是在政治、经济两种体制比较均衡的基础上,根据由政府 and 民间的互动确定的‘规则’形成的。所以,人们较少有变革体制的强烈欲望。”^①

关于“两种经济体制”各自具有的特征,寺西重郎作了如下阐述。

在“明治大正经济体制”的标题下,他这样写道:“这种经济体制是市场型体制,具有企业由大股东支配、银行和传统产业存在独特金融关系、作为中间组织的地域经济圈发挥重要功能三种属

① 寺西重郎:《日本的经济体制》,岩波书店2003年版,第26—29页。

性。”紧接着，他对这“三种属性”分别做了解释：

第一，“称这种经济体制是市场型经济体制，有两重含义。一是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受到限定，政府的职能主要限定于提供纯粹的公共财产即基础性公共资本；维持法律秩序（警察、司法、消防等）；提供安全保障（军事、防卫、外交），以及提供治水、港湾、基干道路，基干铁路等其他公共财产（设施）。二是这一时期对市场体制的重视，与其说是基于关注市场效率、将市场的失败与政府决策的失败进行比较等认识，毋宁说是受到在野的经济人即‘民’，反对由藩阀政治家和官僚支配的‘官’支配经济的风潮的支撑。”

“就第二项属性而言，这一时期的大企业所需资金的基本部分，均以股份的方式筹措。由于成为股东的资产家的数量有限，因此股份的分散程度较低，即便没有所谓的支配性股东，也是按照大股东的合议进行企业管理。不过，由大股东管理企业为中心，并不意味着银行不重要。银行的资金主要借贷给商业部门。商业部门将这些资金作为股份投资于大企业，或将这些资金提供给中小企业。银行作为资金的中介，依存于以商人为中介的重复金融中介。因此，大企业通过股份筹措资金，和银行作为金融中介扮演重要角色，是不矛盾的。”

“第三项属性是，由于当时政府的介入是以提供公共设施为中心，因此在政府和民间横亘着作为地域经济圈的中间组织的机制，是自然机制。这种中间组织的功能，在政治史上经常被称为‘将利益向地方诱导体制’。”^①

关于“高速增长期的经济体制”的特征，寺西重郎这样写道：“高速增长期的经济体制的特征是：政府以规定和制约为中心，广泛介入经济；经营者占主导地位的日本企业体制正式形成；在金融体制中银行占据中心地位；通过业界团体对产业利害关系进行调整。”同样，寺西重郎也随之对上述特征逐一作了阐释：

第一，“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主要采取通过产业政策左右民间企业活动的形式，中心手段是通过限制生产、设备，设定产业

^① 寺西重郎：《日本的经济体制》，第51—52页。

或行业准入门槛,制定贸易政策等,控制每个产业的竞争度。其中采取的租税特别措施、外汇配额、政策金融等手段,在为竞争创造条件并产生相应效果的同时,还由于具有补助金效应而引导了民间经济活动。政府的介入还对地方自治体的行动产生影响。战后,由于府县知事均通过公选产生,形式上地方自治权有了扩大,但是由于中央政府在财政方面采取了严格的控制措施,因此地方政府不仅在课税标准即地方税的设定和税率方面受到规定和制约,而且在每一次发行地方债券时均要接受严格审查。而且地方岁入不足部分,只能在中央政府规定金额的交付税和中央政府决定事业对象的国库补助金的范围内筹措,事实上地方政府等于被剥夺了对财政的自主裁量权。”

第二,“日本型企业体制具有以下要素:系列企业之间和金融机关之间互相控股并因此确立了经营者对企业的支配地位;通过年功工资和长期雇用形成内部劳动市场”,“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体制在银行的资金动员和企业管治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三,“高度增长长期经济体制的第三根支柱,是业界团体利害关系调整体制。这一体制通过产业政策限制竞争的效果,调整每个产业获得优先乃至独占的机会。”^①

他强调指出:“具有以上各项特征的高度增长长期的经济体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由盟军总司令部(GHQ)主导的战后改革之后,在日本为了缩小二战期间进一步扩大的与欧美各国的技术差距的过程中,即在重新开始的赶超过程中,至20世纪前半期形成的。”^②

四、战时战后体制连续论

1977年,榊原英资、野口悠纪雄发表了《大藏省·日银王朝的

① 寺西重郎:《日本的经济体制》,第56—57页。

② 寺西重郎:《日本的经济体制》,第58页。

分析——总体战经济体制的终结》一文，提出了“支撑日本经济高度增长的体制，基本上是战时总体战体制的继续”的“假说”。^①但是，这一“假说”在日本经济持续景气的 70 年代和 80 年代并未获得重视。1988 年，山之内靖发表了《战时动员体制的比较史考察——为了了解今日日本》一文，提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为进行“总体战”而进行的战时动员，“是形成战后日本‘体制社会’的起点”，即进一步强调了日本战时和战后经济体制的“连续性”，对上述“假说”予以肯定。^②

20 世纪 90 年代后，以“泡沫经济”的崩溃为背景，不少日本学者对“今天的日本经济体制究竟存在什么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并再次提出了战时和战后经济体制存在连续性的理论。其中最著名的是下述三种理论。

1. 现代日本经济体制源流论

由冈崎哲二、奥野正宽编纂、作为 8 位日本学者共同研究成果的论著《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源流》，是“现代日本经济体制源流论”的代表作。该论著通过对日本金融体制、企业体制、劳资关系、业界团体、财税政策、农业状况等各经济领域在战时和战后的变迁的考察和比较分析后指出，日本至战前 30 年代的企业管治（Corporate Governance），即由财阀家族确保股东主权的经济体制，是属于“直接金融”体制的盎格鲁—萨克逊型的自由主义经济体制。但是在中日战争爆发后，这一经济体制迅速转变成了日本型经济体制。正是转变后的体制，构成了促使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后经济体制的原型。对此，《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源流》一书的第一章即作了明确论述：“按照历史的观点，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最大特征，即构成这种体制的诸多要素，都是 20 世纪 30 年代至 40 年代前半期，在日本经济的重工业、化学工业化和战时经济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在此之前，我国的经济体制虽然残留着某种程

① 榊原英资、野口悠纪雄：《大藏省·日银王朝的分析——总体战经济体制的终结》，《中央公论》1977 年 8 月号。

② 山之内靖：《战时动员体制的比较史考察——为了了解今日日本》，《世界》1988 年 4 月号。

度的落后性,但基本上是同欧美诸国相似的正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这种市场型经济体制自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逐渐发生变化。在 30 年代政府构筑战时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这种变化骤然得以加速。”“现代日本的社会经济体制,从历史上来看是比较新型的体制。”^①“构成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大部分要素,都是在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时期,为了对国家资源进行总动员而实施‘计划经济化’的战时经济的需要,以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实施‘统制经济’的需要而制定的。”^②

2. 1940 年体制论

1940 年体制论的代表作,是野口悠纪雄的《1940 年体制——别了,战时经济》。野口悠纪雄在这本论著中对“1940 年体制”的含义作了明确解释:“‘1940 年体制’一词,最初是在自民党一党体制崩溃的 1993 年夏,由《日本经济新闻》的专栏文章首先使用的。该文章指出‘1955 年体制已崩溃,但 1940 年体制仍留存’。”换言之,即战后形成的政治体制在 1993 年已解体,但是战时形成的经济体制依然得以延续。^③之后,他以 11 章的篇幅,论述了“1940 年体制”的形成过程、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和“1940 年体制”的关系、“1940 年体制”的基本理念等问题,明确指出日本战时和战后经济体制的存续关系:“在战前具有浓厚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性格的日本企业和金融市场,在战时经济中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的日本型企业、间接金融体制的原型,存在于战时经济之中。”^④他强调指出:“就经济结构的基干部分而言,虽然日本战败了,但是其战时体制不仅继续存在,而且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发挥了关键作用。”^⑤

在另一本题为“日本经济改造论”的著作中,野口悠纪雄指出了“1940 年体制”所以能够在战后继续存在的三点原因:(1)美国在日本采取了间接占领方式。除了内务省以外,战时官僚体系几

① 冈崎哲二、奥野正宽编:《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源流》,第 2、3 页。

② 冈崎哲二、奥野正宽编:《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源流》,第 274 页。

③ 野口悠纪雄:《1940 年体制——别了,战时经济》,绪言第 6 页。

④ 野口悠纪雄:《1940 年体制——别了,战时经济》,绪言第 21 页。

⑤ 野口悠纪雄:《1940 年体制——别了,战时经济》,第 14 页。

乎被原班保留。(2)有关当局颁布了《过度经济力集中排除法》(简称“集排法”),作为“解散财阀”等“经济民主化措施”的基本准则,采取了分割超大企业的举措。但是这些举措几乎没有触及以大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体制。(3)以冷战格局的形成背景,美国的对日占领方针从“民主化”转为强化日本的经济实力,即所谓“开倒车”。^①

3. 总体战体制论

由山之内靖、J. 维克特·考希曼(J. Victor Koschmann)、成田龙一主编、作为 13 位日美学者共同研究成果的《总体战和现代化》,是“总体战体制论”的代表作。该论著在绪言中写道:“本书由于充满了极具褒义的修正主义内容而在日本读者中引起了很大关注。这里所谓的‘修正主义’,是指本书从不同的角度,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在日本占有支配地位的进步的历史学主流,重新进行了批判性审视和探讨。而上述历史学主流,本身也是在批判战时拥有学术权威地位的历史学和国粹主义的过程中,即作为其批判性对应物成长起来的。”“本书所收各篇论文认识问题的视野和方法、时代划分、观点、同当今历史学的关系,既有不同点,也有相似点。虽然存在这种不同和相似——或者说,正是由于存在这种不同和相似,这本论文集推动了对占支配地位的历史学的有关观点的再探讨。我们希望这本论文集在现代史研究领域,不仅对学生诸君,而且对学术界享有地位的专家,都能成为开拓一条新的研究路径的契机。”^②

之后,该论著分“总体战和结构变革”、“总体战和思想形成”、“总体战和社会整合”三大部分,对“总体战体制”在战后的延续,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分析和论证,并最终得出结论:“战后各项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战时的各项改革是共通的。战时的改革使战前经济体制的制度性基础彻底解体……使战后体制向战前体制回归的道路被封闭。日本的经济虽然也属于市场经

① 野口悠纪雄:《日本经济改造论》,日本经济新报社 2005 年版,第 35 页。

② 山之内靖、J. 维克特·考希曼、成田龙一编:《总体战和现代化》,柏书房 2000 年版,第 7 页。

济,但是在其制度性基础中,包含着在战时计划、统制经济的基础上导入的要素。”^①

强调战时和战后经济体制存在“连续性”的理论,在日本国内不乏赞同者。不少学者在各自的学术领域,为上述理论提供了支持。

栗田健在其论著《日本的劳动社会》中提出,在战时体制下,在经营者和劳动者均被视为服务于国家的对等的劳动者的氛围中,工人和职员“作为从业人员应得到一视同仁”的意识、“废除工人职员差异”的意识得以产生,将“白领”和“蓝领”一律视为“从业人员”的意识开始确立。正是这些意识,构成了战后按企业成立工会的思想基础和历史背景。^②

雨宫昭一在其论著《战时战后体制论》中,将战时的“总体战体制”和战后经济的高速增长放在同一维度上进行分析和考察,指出在总体战的“战时经济体制”和经济高速增长“战后经济体制”期间,劳资间、农民间、其他社会阶层间的“社会均质化”的不断演进,推动了日本现代社会的形成。雨宫昭一着重分析了在日本战前形成的“自由主义”体制向 40 年代“翼赞体制”变迁的过程中,日本各地国民重组的实态和功能,指出:“在政府、市町村、最基层的邻组三个层面进行的各地域的国民重组,孕育了全体意见一致的契机,使由强权牵引的社会平准化、均质化得以演进。其具体形态,就是随着日本社会各阶层在空间上的混居,阶层之间的横向交流虽受到阻隔,但自上而下的纵向交流却得以强制推行,从而导致了‘社会混住化’趋向的发展。进而,当局对中小企业和商业的筹建和结构调整,导致了无产阶级的形成;通过对农民的抑制和诱使其转入军需工业,推动了工业化的发展;通过强制推行,使大众福利化得以问世。上述三者和推进它们的体制,几乎均同‘现代日本社会’的特征和结构有着直接的联系。”他认为,这些在战时出现的社会变化,构成了战后民主社会的重要基础。^③

① 山之内靖、J. 维克特·考希曼、成田龙一编:《总体战和现代化》,第 285 页。

② 栗田健:《日本的劳动社会》,东京大学出版会 1996 年版,第 119 页。

③ 雨宫昭一:《战时战后体制论》,岩波书店 1997 年版,第 199 页。

女性问题专家、女性学者上野千鹤子在其论著《民族主义和性》中,将战时和战后女性的“国民化”即协力参战和参政,视为日本建设国民国家的一种整合方式,即将战时和战后女性的“国民化”,作为一种延续的过程加以把握,否定了以往认为由于战后的现代化和民主化妇女才获得解放的看法。她在考察了战时女性地位的变化后提出:“战争期间女性协力参战和国家对女性的保护,使女性的‘国民化’作为‘现代计划’的重要一环而得以规定。”她认为,战后女性参政权的获得并参与政治,就是战时女性作为“国民化”一环的扩展。^①

另一位女性学者前田裕子在《战时航空工业和生产技术的形成》一书中,以三菱重工为例指出,在战争期间,生产现场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工厂制造产品的技术”和“工厂的经营管理”开始得到整合。按照她的观点,“生产和管理相结合”这一作为“日本型生产管理体制”重要特征的“现场主义”,就是在战时形成的。^②

一些美国学者也涉足重新审视日本现代经济体制的学术思潮,为战时和战后经济体制存在连续性的观点推波助澜。

美国学者沃尔弗莱恩和卡莱尔在《日本:权力结构之谜》一书中提出:“不可否认,在许多方面可以将战后的日本视为新日本。……但是,如果对日本的权力是如何被行使的这一问题进行考察,那么可以说和变化相比,继承更具有重大意义。不仅统治阶层的动机得以继承,而且由他们构建的制度也得以继承。成为战后日本主体的,不是在美国占领军主导的‘民主化’引导下重建的经济和政治体制,而是在战争中形成的‘封建性’习惯。”^③

美国学者路易斯·杨格在《总动员帝国——满洲和战时帝国主义的文化》一书中写道:“我试图通过使用‘总动员’一词,阐述日

① 上野千鹤子:《民族主义和性》,青土社1998年版,第93页。

② 前田裕子:《战时航空工业和生产技术的形成》,东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7页。

③ 沃尔弗莱恩、卡莱尔:《日本:权力结构之谜》,早川书房1994年版,第57—59页。

本社会给予‘满洲国’的广泛而巨大的冲击。”杨格通过对大众传媒、官僚制国家、利益集团、乌托邦意识形态、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介入等“总动员”各个层面的探讨,批判了认为战时的日本帝国产生于“未成熟的前近代国家”的传统观点,指出当时的日本是由支撑新型帝国主义的现代产业、大众文化、政治的多元主义、新颖的社会组织创生的,是日本战后社会的原型。^①

强调日本战时和战后经济体制存在延续性的理论和学说,必然涉及如何评价日本的战后民主化改革的意义。按照冈崎哲二、奥野正宽等人的观点:“从表面上看,经过由占领军主导的民主化、经济高速增长、国际化等变革过程,战时日本的经济体制发生了超脱原型的很大变化。但是,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本质,实质上是由国家总动员体制强行导入的战时经济体制严格规定的。”^②野口悠纪雄则更加明确地指出,不仅所谓战后改革的“三大成果”,即制定新宪法、解散财阀、农地改革,本身有着很大的局限性,而且战时日本形成的一些制度和体制,并没有被根本触动和发生变革。他写道:“所谓历史研究,实际上仅分析已经发生的事,不以‘没有发生的事’为研究对象,关于战后改革的研究也是如此。对农地改革、解散财阀等已实际进行的改革,迄今已有颇多著述。但另一方面,关于‘哪些方面没有得到改革’的研究,却少得令人惊异。然而,就战后改革来说,最重要的恰恰是那些没有得到研究的方面,特别是官僚制度和金融制度的连续性。因为,官僚制度和金融制度构成了当今日本经济的中枢。”^③

上述日本著名经济史专家提出的言之凿凿、持之有据的各种理论、观点,特别是寺西重郎提出的“这两种经济体制,都是在日本明治以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广泛的各阶层的人们围绕经济体制的选择的互动中形成的”这一观点,使我深受启发。使我决心不揣浅薄,沿着这条路径继续探寻。具体而言,即:在以历史学的眼

① Louise Young: *Japan's Total Empire: Manchuria and the Culture of Wartime Imperialism*,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p. 7—9.

② 冈崎哲二、奥野正宽编:《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源流》,第275—276页。

③ 野口悠纪雄:《1940年体制——别了,战时经济》,第5页。